



钱穆

□许志杰

1939年9月顾颉刚受聘出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，第一要务就是“动手动脚”去找人，延聘国学研究领域的顶尖高手，钱穆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。出生于1895年的钱穆，字宾四，是那个时代自学成才的励志榜样。后人评价说：“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乡村，一生从未上过大学，更未出洋留学，完全靠自学成为名家，由乡村小学教师、中学教师走向大学讲台，成为大学教授、名教授、一代学术大师。”

顾颉刚与钱穆相识于1929年四五月，那时顾颉刚请假离开中山大学，带着家人返乡苏州，钱穆正在苏州中学任国文教员，主讲“国学概论”。当年4月15日，应苏州中学邀请，顾颉刚前往演讲，题目是《对于苏州男女中学的史学同志的几个希望》，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。当时顾颉刚在史学界名气已经非常大，能到一所中学演讲，着实令人吃惊。估计，这样高深的话语，苏州中学的学生们理解起来有难度，但是作为讲授“国学概论”的钱穆而言，会有所指导和触动，对他日后继续历史学研究是有启迪作用的。此次会面成为钱穆走向史学家行列的始点。当年夏季，顾颉刚再回苏州，看见钱穆正在撰写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，非常看好，嘱其为《燕京学报》撰稿，并力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，因苏州中学校长力挽未成。

1930年秋，钱穆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赴燕京大学就职，顾颉刚对初来乍到的新“北漂”钱穆给予了足够的照顾，使钱穆感到“使余无身居异地之感”。1931年夏，钱穆收到北京大学聘书，并得清华大学兼职，钱穆认为这一定是顾颉刚从中洽定，但是他并未就此事当面问过顾颉刚，两个人都是敏于行而讷于言之类。1937年7月15日，北京大学教授集会，决议通电拥护抗战，钱穆参加，并于当年10月离开北平，辗转 to 衡州南岳衡山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。长沙临时大学解散后，入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，直到1939年暑期接顾颉刚聘书，赴西迁至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。

钱穆在《师友杂记》一书中专有《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》一文，大致介绍了自己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的一些情况：1939年钱穆在昆明避战，正准备返回家乡苏州前“颉刚来访，彼获流亡成都之齐鲁大学聘，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……余允颉刚之约。惟既拟归苏州，须秋后始去成都，颉刚亦允之”。钱穆返回苏州后，因著作《国史大纲》出版不顺，未能在当年秋后到齐大就职，于是写信给顾颉刚：“余通函颉刚，请假一年。顾颉刚复函，允薪水可照发，嘱余开始编《齐鲁学报》，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。余念，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。”

虽然钱穆着手编辑《齐鲁学报》是1939年，但第一期出版时间是1941年1月，读者看到学报的时间会更晚。钱穆亲撰《发刊词》：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本有无定期刊物一种，名曰《国学汇编》，十余年来，几度刊布。国难以逮，学校播迁蜀中，研究所改弦更张，于是有学报之结集。年定出两期，兹当首期创刊，谨缀短辞以稔读者。夫学问研讨，本属平世之业，然兵燹流离，戎马仓皇之际，学术命脉，未尝护持赓续之望。此其例，古今中外，不胜枚举。”《发刊词》文采飞扬，用词不像钱穆平日著作那样深奥，读来流畅上口。第二期出版的时间比上期晚了半年，页码由第一期的221页增加到254页。是不是在编辑这期时，钱穆已经知道了要停刊的消息，额外加量，以便消化约来的文章？第二期作者阵容更齐整，文章类型更加丰富，使《齐鲁学报》更趋完整与丰满。齐大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出版风气极盛，对当时国学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钱穆到达成都齐大国学研究所的时间大概

是1940年秋天，他记录道：“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，借用华西大学校舍。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，距城二十里许。有研究生十许人。有一藏书家，避空袭移书赖家园，借研究所用。园中有一亭，池水环之，一桥外通。池中遍植荷，池外遍树柳。余尤爱之。风日晴和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。余又兼齐鲁大学课，由赖家园赴城，坐鸡公车，平生所未见也。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，在学校宿一宵，如是以为常。”

1941年6月，顾颉刚接受朱家骅邀请到重庆主编《文史杂志》，国学研究所内事务由钱穆具体主持，时至当年9月，顾颉刚正式赴重庆就任，钱穆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。当时所内设两个研究室，十多名研究生，严耕望、杜先简、钱树棠跟钱穆研究明清学术流派和历史地理考证。接掌国学研究所工作，钱穆沿袭旧制，继续着顾颉刚的研究、治学、治所方略。稍有不同的是钱穆与顾颉刚个人性格迥异，因而治所风格与顾颉刚很有出入。

钱穆的学生兼助手严耕望回忆当时的一些情景说，这两位先生对同人的看法大不相同。顾先生把一切人员都视为同事，平时称为先生，除夕吃年夜饭时，举杯向大家说：“一年来都辛苦了，谢谢各位！”钱先生却完全是另一番态度，他把所有助理员、书记都当做学生，平时直呼姓名。又顾先生负责所务期间，规定门房中，除星期天外，有一人值班，上自他本人，下至书记，轮流当值。自己当值时，自上午八时起就拿了简单文具，书本，坐在门房书桌工作，有客人来自己传呼。钱先生就懒得值班。这些小节就显得两位先生的性格、作风有很大差别。

方诗铭是顾颉刚和钱穆的学生，在《钱宾四先生散忆》文中他对两位恩师的印象是，钱穆先生“对颉刚先生有知遇之感，相处甚得，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，颉刚先生亦倚之如左右手……宾四先生善言辞，长于演讲，而颉刚先生则反是，上课时多写黑板，略加解释而已。时我年龄甚轻，学问之道仅初窥藩篱，对两先生的渊博浩瀚惟有瞠目震惊罢了。宾四先生讲课时颇带乡音，蜀人初听之下，颇有茫然之感。其后我尝举以告友人石念海，感同身受。念海山西人，往年初听演讲时，先生多次提到‘王今翁’，念海亦茫然，不知此为何人，后始知所谓‘王今翁’，实系王荆公(安石)，又为之粲然。久之，我对先生的乡音渐有所悉，再久之，更不觉先生言辞中有乡音，如听一般的普通话。先生授课，于兴致之处，时高举双臂，慷慨激昂，间更纵声而笑”。

钱穆对年轻学者给予很多鼓励，就研究所的正式工作而言，不论研究员或助理员，都各自选定论题，自由钻研，只是每个星期六举行一次讲论会，分组轮流讲演，或作读书报告。

《责善半月刊》原意在供本所青年学子练习撰文，但同学写文章的并不多，倒是很多已经成名的学人投稿刊出，因为当时大后方的经济困难，学人论文刊出的机会不多。严耕望来所之后，钱穆让他多为杂志写稿，最好每月一篇。每有一篇文章刊出，钱穆总是很兴奋地说：“那篇文章写得非常好，如能如此，《责善》前途有望了。”严耕望说：“先生教人治学，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，切忌近视，或规模太小。在讲论会上，固然常常这样提醒大家，在师生成群外出散步、旅行或与我个人闲谈中，也一再强调这些意见。1942年9月28日，师生多人徒步旅行到新都赏桂，当日途中，先生谈得很多，我在日记中写下了两千多字。例如先生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，要成为移风易俗的大师，这才是第一流学者！专守一隅，做得再好，也只是第二流。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地混日子，你们有意读书，已是高人一等，但是气魄不够。过了几天的一个晚饭后，钱穆在大门外又与严耕望闲谈，钱先生说：“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，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，否则绝无大的成就。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一切，倘使走来就是小规模的，等到达成这个目标后，便无霸气。一步已成，再走第二步，便吃亏很大。”严耕望记得最深刻的是钱穆对他的告诫：“你将来必然要成名，只是时间问题，希望你成名后，要自己把持得住，不要失去重心。如能埋头苦学，迟些成名最好。”

严耕望也没有辜负钱穆对他的期待与鼓励，跟随钱先生在齐大国学研究所研究学习三年后，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中研院史语所追随傅斯年，逐渐历练成为治史大家。更为可贵的是，受钱穆先生影响至深的《治史三书》至今还是畅销书，是大学历史系学生的入门必读书。

自1939年秋至1943年秋离开，钱穆只有1941年上半年去嘉定(今四川乐山)的武汉大学讲学半年，其他时间一直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和历史系做研究、教书。1943年秋，齐大国学研究所因故停办，钱穆率弟子转投华西大学。翌年齐大国学研究所复建，顾颉刚再任国学研究所所长，主持全面工作，遗憾的是顾颉刚此次重掌国学研究所，并未再邀只有一墙之隔的钱穆共事。抗战结束，顾颉刚到复旦大学任教，钱穆于1947年返回苏州，在此两位又见了一面，乃平生最后之一面。

【文化地标】

董氏碑亭：记载黄河岸边村庄的变迁

□马光仁

“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。”“河流迅且浊，汤汤不可陵。”这是昔日黄河的真实写照。

非汛期时，黄河一路奔腾的波涛，舒缓而温情。洪水来袭时，滩区家园顿成泽国，肆虐的河水像脱缰的野马，冲出河槽，漫过庄稼地、淹没村庄、冲毁房屋……因此，黄河边上的村庄被称为“被黄河水追着跑的村庄”。“黄河边，十年九淹，干旱满蚂蚱，涝了是鱼虾”，这是流传在济南市长清区黄河滩区的民谣。

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沿黄滩区的董庄、曹楼村等24个迁建村，世代代住在黄河边，享受着黄河的滋养，也烦恼于黄河泛滥带来的灾害。2020年5月，归德街道24个滩区村的1万多人，全部搬进了安置区——崇德苑社区，实现了“安居梦”。

位于黄河岸边的“董庄碑亭”，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记载的文物，它不但记载着董氏家族的历史渊源，也记载着黄河泛滥的历史，向人们倾诉着黄河岸边村庄的变迁。

归德街道西部黄河岸边的董庄村，是一个有着近千人的村庄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村北有长清最大的董庄黄河港口，归德南大沙河丰盛的沙石，通过船运到下游的中国第二大油田——胜利油田所在地，运输路上车水马龙，一天到晚车辆不停，董庄村也成了一个很热闹的地方。



据“董氏增订谱系序碑”和有关史料记载：“余祖世籍洪洞，明洪武二年(1369年)，经迁稠民至直隶枣强(即今天的河北省枣强县)，永乐二年(1404年)复迁于此……”命名董家庄，民国年间开始叫董庄村，直到今天，村内90%为董氏姓。

在董庄村西，濒临黄河的地方是一块空地，在空地中间建有一个长方形的透明院墙，院内就是董氏碑亭，这处碑亭是2014年由村民董林旺、董金贵等人发起，由董氏家族人捐款兴建的。这是一处类似悬山风格的碑亭，由前后各四根红色的圆柱支撑着亭子的上顶。亭柱的上面置有矩形连接梁，再上是起脊的亭顶。亭脊上装有二龙戏珠的陶瓷构件，两端安有嘴巴向外的鸱吻，四条下落的边脊上还有数量不少的仙人骑兽等装饰部件。所有的瓦片及瓦当皆为青色，在瓦楞、瓦脊上留有青苔。亭子正上方书写着“董氏碑亭”四个大字。

碑亭坐北朝南，东西长约8米、进深5米、通高4米，由于是亭阁结构，加上周围空旷没有任何遮挡，这座碑亭显得宽敞明亮。走进亭内，就会发现有 three 石碑立在亭子内的东部，前面并排两座，后面一座。后边的石碑高2米、宽80厘米、厚30厘米，上面记载着董氏先人修建家庙祠堂的经过，日期是乾隆六十年(1795年)，但碑文大部分已看不清楚。

前面立有两座高1.8米、宽60厘米、厚20厘米的石碑，北面这座石碑建于民国四年(1915年)，上面的字迹也很模糊，内容同样是记载先人及建庙修庙的前后经过。南边这座石碑，是碑亭中最珍贵的，仔细观看上面的碑文我们得知，董家祠堂最早建于1636年，因黄河水泛滥泡坏倾废。董家人在民国四年重修并制作亭内北面的石碑一方，而且建造得非常庄重严整。只是由于黄河滩地松软的缘故，祠堂的墙基不稳，屋顶也时常漏雨。民国十年(1921年)夏，大雨下了一个多月，此时河水暴涨，董庄村周围一片汪洋，董家祠堂被毁，董家人费尽周折，再次将祠堂修好，之后又在附近建起村学一座。

这篇碑文的撰文兼书写，是民国年间师范毕业的董泗澄。由他所书的文字刚劲有力、舒展大气、内容全面、记述准确，不仅是一幅优美的书法艺术作品，还提供了当时社会生活多方面的信息，尤其是民国年间有关气象资料的记载，更是非常难得。但让人遗憾的是，此碑上方左右两个碑角缺失，整片碑文也不够完整，最重要的年代落款正好在缺失的碑角上，好在留下了“岁次壬戌年仲秋”等文字，经过查询天干地支的纪年顺序，我们可以知道此碑制作于1922年秋天。

据董庄村75岁的董金贵老人介绍，董家祠堂原先在现在碑亭北边的地方，由于河水泛滥淤积的缘故，历史上毁了修、修了毁，不知修了多少次，原先的祠堂也早已埋入地下。这三座石碑也是经过数次的搬动，才挪放到现在的位置，现在的碑亭是村民前些年为保护这三座石碑而专门建起来的。

投稿邮箱：qlwbrwq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